

辨僞叢刊之一

古
學
考

廖平著

張西堂校點

古學攷

廖平著

張西堂校點

辨僞叢刊之一

景山書社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付印（一千冊）

定 價 三 角

著作者

廖

校點者

張

西

堂

出版者

景

山

書

平西成府槐樹街三號

印刷者

引

得

校

印

所

總發行所

景 山 書 社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橋 川

考 學 古

序

井研廖季平先生是清末的一位經學大師。他在一八八六年（清光緒十二年丙戌）刊行所著今古學攷；隔了八年之後，在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一年甲午），因爲他的今古學攷『歷經通人指摘』，他又作成這一部古學攷來『辨明古學之僞』。這書主張『今學傳于游夏，古學張于劉歆；今學傳于周秦，古學立于東漢；此今古正變之分，非秦漢以來已兩派兼行也。』這樣子，一反其舊說，其態度略與康有爲新學僞經攷相同（康書刊行于一八九一年），且有兩處（本書頁一九、二九）明用康氏之說的。

這書在許多地方對於他的舊說都大加以改訂，實在是比較地有進步之作，但是也還有一些地方未說到的。例如在今古學攷今古學宗旨不同

表中他以爲『先秦子書皆今學』而在兩戴記今古學分篇目表中又將從荀子禮論篇抄出來的三年間列在古學一類，這是很顯然的一個矛盾。在今古學統宗表中他以爲『穀梁全同王制』而其實穀梁王制是不盡相合的。王制說：『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穀梁桓四年傳却說：『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王制與公羊傳『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歲三田正相合，與穀梁傳是不合的。在今古學攷卷下，他說：『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名之」，左氏說「既歿稱字而不名」，許（愾）以爲穀梁同左氏；按此皆後師荀會之說，于經傳無明文同異。』實則桓二年穀梁傳明說：『子旣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旣死，君不忍稱其名。』廖氏以爲傳無明文，自是一時間的疏忽。這些地方在這書中都未加修正，或者因爲這不是重要得了不得的問題。

至于經今古文的問題，這本是一件很不容易解決的公案；這一問題如若重新提出討論之時，是應當：第一，對於這兩派最初爭論的要點——古文經傳的真偽問題，予以謹嚴的攷辨；第二，對於這兩派因經立說的主旨——今古經說的同異問題，予以詳細的畫分。這兩派的發生，實在是各有各的時代背景，各有各的相當立場，而其興替變化，都是有不得不然之勢的；如若不明瞭這一點，對於這一問題也是無從獲得解決的途徑的。廖氏在兩書中所用的方法都欠精密，當然他的立說是不免有許多錯誤和混淆不清的地方，然而這不是說他無相當的成功。

本來古文經傳的真偽問題，在劉歆爭立古文經的時候，師丹謂其『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後來公孫祿又說他是『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在當時已人言啧啧，懷疑他的甚多，並非無一人識其詐者，這種情

形是當注意的。我們再試看漢人之作僞，如後得之僞泰誓，張霸之僞百兩篇，後者雖當時敗露，前者則漢世通行，足見作僞是不必要校書中秘的。劉歆以帝王之懿親，憑藉着淵源的家學，他可以利用民間的三家詩而僞毛詩，利用民間的春秋國語而僞左氏春秋，雜采篇記而僞逸禮，雜采書傳而僞古書；他之僞造古文經傳，更無須要校書中秘的；而他曾領校秘書，更有作僞的可能。史記河間獻王傳魯恭王傳并無得古文經之事，而當時之人言嘖嘖說他是『改亂舊章』，『顛倒五經』，真是『事出有因』，並非『查無實據』；『如若不信劉歆作僞，則未免太忽略史實了。』廖氏在今古學攷中以爲『今孔子晚年之說，古孔子壯年主之。』而此書則就劉歆移書以證左氏學不行于西漢，其書『實不獨傳春秋』（本書頁四三）『毛傳與杜林周禮訓相同，但明訓故而已，非西漢以前之師說』（本書頁三二）周禮『乃劉歆本

佚禮羼臆說揉合而成，爲王莽以後之書（本書頁三八等）。他算是對於古文經真僞問題比較地明瞭一些，所以才能有『今學傳于游夏，古學張于劉歆；今學傳于周秦，古學立于東漢』的結論。

在毛傳中，『大雅和商頌等神話詩全然成了合理的解釋。又拿他和齊魯韓三家詩來相比較，而毛詩這斷定是不安穩的，此其一。又前漢諸儒的經注大概是疏疏落落的，沒有像毛傳這樣的整齊和簡潔。抵是改訂前人的注說才有。如尚書的僞孔傳，論語的何晏集解，就是這榜樣。毛傳很簡潔而整齊，就那點，像由後漢以來的改竄，此其二』（用本田成之《經學史論語》據譯本頁二〇九）毛傳的體例，真是像『東京作章句，必曲曲以敷陳』，而不像『西漢尙微言，不字字而比傳』（用皮錫瑞語）。其著述之風與後漢接近，而所謂『六詩』與周禮相合，史的意義之濃厚也相合，應當

是劉歆與其黨徒所爲，否則不當有這樣濃厚的史的意味的。

左氏學不行于西漢，劉歆始引傳以解經，劉歆傳已明言其事，則凡例自是他作的。有人以爲賈誼張敞曾引左氏，不知『賈書』則楚惠王等八事，不知採自何書……本與左傳絲毫無涉……自古人異事同傳記所載，何止一端？（用章炳麟《春秋左傳讀叙錄語》）我們不可說賈張諸人之所引即是左傳，而謂左氏傳在劉歆以前就有的。廖氏據移書以證其并無傳授，則在劉歆前只有不解經的原本左氏而已。公穀並是經傳別行，而沒有人說治公穀者之引傳以解經，因爲公穀本是解經的體例呵。歆傳說歆引傳解經，這正足以證明原本左氏之不解經，同時也是劉歆作凡例的極好的明證。

廖氏以逸禮即周禮之原文，這話是不足以令人信從的。但是周禮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可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

丘奏之，則地示皆出。』這種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的說法在呂覽月令和淮南子時則上是都沒有的。大概這種理想正是受了漢成帝建始元年始作長安南北郊的影響。周禮大宗伯有所謂『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五嶽』這一詞之應用是很晚的。而在大司徒上又說『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辨十有二壤之物。』在呂覽的有始覽上只說『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淮南子天文地形也只說：『天有九野，』『天地之間，九州八柱，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周禮這種十有二土，十有二壤的說法，應當是漢武帝部十三州以後才能有的。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對日食月食一樣地重視，這在其他書中是少有的，而與左傳莊二十五年『非日月之眚不鼓』相同，這正是劉歆的凡例所云，足證兩者是同出於一門。在周禮中以『雞人』屬春官，『羊人』

屬夏官，與呂覽月令不合，與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相合，則其著作時代也當在武宣以後。就周禮的其他制度來看，也多是西漢末的社會制度的反映（別詳拙著《經學史講義》），這都足見其爲劉歆時之作品。

逸禮據邵懿辰說來是有僞造的嫌疑的，而在東漢古文盛行之時，馬鄭所注的尚書只是『伏生所誦』，則孔氏之本豈不是怪可疑的？當時的人之疑劉歆，真是『事出有因』，並非『查無實據』。僞證昭昭，如何抵賴？但是廖氏在本書中，一方面說『漢書以周禮毛詩並傳于河間，藏在秘府，左傳皆有師傳授受；後漢儒林傳以建武立毛詩博士，皆六朝以後僞說行世，校史者據誤說所羼改。』……古文尚書毛詩爲賈逵謝曼卿始刲之說』（本書頁三七），這種說法既嫌證據薄弱，也未免太矯枉過正。而一方面又謂『孔氏寫定尚書，以今文篇數推其異者寫成隸字耳。毛公詩，班云「自以爲子

夏所傳，「此二家亦今學也，」「左傳及官禮皆爲今學也。」（本書頁四五。）他畢竟是上了這位『作僞名手』劉歆的大當了！

關於今古經說同異的問題，廖氏在本書說：「今古之分，師說訓詁，亦其大端。今學有授受，故師說詳；古學出于劉歆，故無師說……」西漢長于師說，東漢長于訓詁」（本書頁四二）。這比今古學攷說的多了一點。但是這也是不完全對的，因爲東漢後來也有師說，而西漢也非絕對不講訓詁。關於這一點，近來錢玄同先生在重論經今古學問題一文中曾將近人所謂「今文家言」「微言大義」古文家言「訓詁名物」這是兩家最不相同之點，「與或又謂『古文家言』『六經皆史』，今文家言『六經皆孔子所作』」一一地加以糾正了。廖氏此說以師說訓詁分今古，與以『微言大義』『訓詁名物』分今古是差不多的。今人或謂『今文學視孔子爲哲學家，政治

家，教育家，古文學視孔子爲史學家。」並且說是『今古文家對於六經次第的排列是有意義的，古文家的排列次序是按六經產生時代的早晚，今文家卻是按六經內容程度的淺深。』這是誤會了康有爲新學偽經考中『其有舍史遷儒林傳而顛倒六經之序者可引此案以決之』的誤說而然的。

在古文家，劉歆亦謂『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並不是只認孔子爲史學家的。我們知道樂本無經，樂的內容決不比詩書還要深，書的內容也未必比禮樂都淺；西漢初六經的次第本是無一定的，更無以見得今文家對於六經的排列是按六經內容程度的淺深。所以說今文家只視孔子爲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這也是不對。

今古之分，是應當從各方面來想法子的。然而在西漢的今文說與東漢的古文說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就是詳細地來設法也是很不容易的。

事情。如若勉強地說，則廖氏今古學中就禮制來分今古學的異同是值得注意的，因為禮制範圍甚廣，無妨詳細地分，而且同時也可以看出時代背景來。他如篇數的多寡，文字的異同，說解的變遷，都是今古經說同異中的問題，而後者是尤其值得我們注意。在西漢今文家之分化，與東漢今古說之揉合，及今古兩派的爭論，都是互相有影響的。這又是因人而異了！在本書中，廖氏以爲：

舊以今古同重；李命三以爲古不如今，其說是也……今學既爲正宗，而謂別派亦精確詳審，與之相比，固非情理所有。若能果力，再補義例，突過前賢，亦勢所能。若謂足敵今學，則恐終難。

這實在很難以籠統地來說的。

至于今古之分，其所以產生之故，是由于不得不然之勢。我們只看小

夏侯之從大夏侯分化出來，如大麓之釋爲大錄，及孟侯之釋爲諸侯之長，實是基于一種合理的要求，而且後者是比較有根據的。兩者都不外爲有進步的說法。即如孟喜之改師法，那也是能立一新說，故雖有假冒的嫌疑，而結果仍立諸學官。要求進步，要求合理，這是一定會有的趨勢，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今文家的分化，可以如此看去，不必是爲的利祿之路，也不一定是故意立異；古文家的產生，也有的是如此，一半固是因爲別有作用，也有爲的是『合理的』解釋。但是那些新說往往太合理了而不合于古，往往又脫不了那產生的時代所與的影響的，所以今文家說，古文家說，在現在看來都是各有短長；而古文經說，因爲根據僞的本子，雜採僞的傳說，在這些地方是不及今文經說的。在西漢末，明知孟喜之改師法而亦立于學官，明知張霸之僞造百兩而『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減其經，』這是無異于獎勵作僞，結

果引起了劉歆的大批作僞，這好像也有一點不得不然之勢的。所以依所謂利祿之路與合理的要求，今文家的分化與漢廷的措施等看來，劉歆之作僞當比王肅之僞家語僞孔叢乃至于僞古文尚書等等有理由得多了！

廖氏在這書中改訂他的舊說，因而確認劉歆之僞古文諸經，雖然不免還有些不澈底的地方，然而確是一部較有進步的作品。這書在六譯館叢書中，沒有單行本的流傳，學者知是書者較少。顧頡剛先生本打算將這書校點行世，他差不多已經標點過三分之一了。因為很盼望這書早一點出版，在暑期中由我將這書校點完成，現在更不自揣量地來寫這一篇序。

一九三四除夕之前一夕，張西堂謹序。

時寓居于北平中南海居仁堂之西四所。

目錄

序

張西堂

葉數
一

本書

緣起

著書宗旨

王制作於孔子弟子

書詩所言禮制與王制合

周禮專條無徵，不能與左氏比

樂與古書毛詩非古學

儀禮經記皆今學